

清代广州

与西洋文明

◎郭秀文 等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

郭秀文 等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郭秀文等著.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81120-019-8

I. 清... II. 郭... III. 文化史—研究—广州市—清代
IV. K296.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168 号

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

作 者: 郭秀文等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李 行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7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ISBN 7-81120-019-8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3005 室
邮编 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103-6001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 言

从中外交流史上看，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历来相通，经常是互为表里，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进入当代，这种经济与文化的互相交融更加突出，两者的界限更加模糊，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目前，我省在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强调要建设文化大省，这无疑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举措。本书的编撰旨在为我省的文化大省建设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

广州在我国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从汉代到现代，绵延两千年，广州一直是沟通中外关系的重要门户，中外文化的交流非常频繁。特别在清代，西方文化经常率先传入广州，从而与中国的文化碰撞、交融，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将闽海关、浙海关、江海海关关闭，仅留粤海关对外通商，此后，粤海关便成为全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为止。在这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广州口岸的辐射作用是巨大的，国内的商品由此出口，外国的商品由此转销内地，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唯一通道。广州得风气之先，不仅给内地带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和新的观念。总之，广州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有着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认真探索总结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我们认识广州乃至认识

中国，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虽然广州有如此辉煌的历史，但与一些省市相比，广州的城市史研究却显得相对滞后。对此，蔡鸿生教授曾在《广州与海洋文明》一书中提出倡议，希望加强广州市口岸史的研究，同时，他还指出，口岸史不等于外贸史，因为“从历史上看，精神舶来品与物质舶来品形影不离，几乎同步登上广州口岸。”循此思路，本书对西洋文明东传的考察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器”（物质文化），一是“道”（精神文化）。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的交流是丰富多样的，本书只是选取五个侧面进行剖析，希望能对了解这一精彩的历史场景有所帮助。

本书由郭秀文组织策划并统改定稿。各章的撰写分工如下：

第一、第二章 郭秀文（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三章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

第四章 陈泽泓（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第五章 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学院）

第六章 陈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

限于水平，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不少疏漏谬误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2006年7月于广州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绪 论	(1)
---------------	-----

一、广州：源远流长的中外贸易交流口岸	(1)
--------------------------	-----

二、清代西洋文明传入广州的五个阶段	(8)
-------------------------	-----

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夕在广州创办的报刊	(11)
--------------------------	------

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者及办刊宗旨	(13)
-----------------------------	------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要内容	(20)
--------------------------	------

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纂方法	(42)
--------------------------	------

四、《中国丛报》的编者及办刊宗旨	(52)
------------------------	------

五、《中国丛报》的主要内容	(61)
---------------------	------

六、其他报刊	(87)
--------------	------

七、作用与影响	(94)
---------------	------

第三章 晚清广州的外语教育与外语读物	(98)
--------------------------	------

一、“广州英语”与“洋泾浜英语”	(100)
二、“红毛番话”、“鬼话”读本	(108)
三、罗伯聃的《意拾喻言》与《华英通用杂话》 ...	(114)
四、《华英通语》与广州版《增订华英通话》	(124)
五、唐廷枢及其《英语集全》	(128)
六、广州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与外语教科书	(136)
七、两广方言学堂的外语教学及其影响	(146)
八、广州格致书院与岭南学堂外语教育的成效	(155)
 第四章 清代西方建筑文化在广州的传播交流	(165)
一、西方建筑直接影响和传入广州的渠道	(166)
二、西方建筑文化对广州社会文化生活的影 响	(194)
 第五章 从明末清初诗文看千里镜在中国的流传	(218)
一、引言	(218)
二、“千里镜诗”的分类	(221)
三、余论	(255)
 第六章 清代西方餐饮文化与西洋音乐在广州的传播 ...	(260)
一、清代广州与西餐	(261)
二、西洋音乐传入广州	(285)
三、葡萄酒的传入	(292)

第一章 绪 论

一、广州：源远流长的中外贸易交流口岸

广州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秦汉时期，广州（时称番禺）已成为我国的主要港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将它列为中国 19 个商业性的大都会之一，称其为“珠玕、犀、玳瑁、果、布之凑”。据说秦始皇攻打岭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攫取岭南的珍奇宝物“犀角、象齿、翡翠、珠玕”，^①而这些物品主要来自海外，可见当时岭南已与外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更发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国际性大商埠，其主要表现是：一是朝贡贸易快速增长。据有关学者统计，当时与广州有海外交通和贸易的有大秦（东西罗马帝国）、波斯（伊朗）、天竺（印度）等 15 个国家。^②二是进口物资品种明显增加。三

① 《淮南子·人间训》有云：“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

② 邓端本、章深著：《广州外贸史》（上册），第 27 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 7 月。

是往来南海的僧人与日俱增。到了唐朝，海上“丝绸之路”逐步胜过陆上“丝绸之路”，广州也随之成为东方的第一大港，外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因而中国市舶管理的专职官员——市舶使也率先在广州诞生。宋朝的国力虽然比不上唐朝强盛，但由于宋朝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重商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宋朝在广州及其他一些重要口岸也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使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更趋严密。其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和外贸中心。到了元代，广州的外贸地位尽管被福建的泉州所取代，居第二位，但并未衰落，依然有很大的发展，仍不失为一个国际性的大港。

明太祖统一中国后，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禁止渔民私自出海。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主要在于：一是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明朝建国之初，倭寇经常南下骚扰我国沿海各省。此外，很多与明太祖敌对的土豪地主纷纷逃到沿海岛屿和海外各国，这些都严重威胁到明政权的稳定。为了防止国民与倭寇和敌对势力联合，有必要禁止与海外的往来。二是为了维护“重农抑商”的传统。明太祖是农民出身，有着强烈的“重农抑商”观念。随着政权的巩固，明朝统治者曾一度致力于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并于永乐三年在广州设立怀远驿，以便接待各国的贡使及商人。嘉靖元年（1522年），因为西方商人的违法经营和倭寇引起的骚乱，明政府遂下令废除了宁波、泉州两市舶司，只留下广州一地对外通商。这样，广州在很长的时间里包揽了我国的海外贸易。

清初，郑成功等以福建、浙江沿海为基地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清政府为了断绝郑成功等抗清力量的粮食物资供应，防

止大陆人民在海上聚集，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禁止官民人等私自出海贸易，如有违反者将严加惩处。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进一步颁布“迁海令”，强迫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居民，分别往内地迁移30到50里，商船与民船全部不准入海。这一法令实施了23年，严重摧残了沿海地区的农业、渔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许多人因此失去生计，流离失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也就是清朝统一台湾的第二年，清政府才又重新开放海禁。康熙认为：“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他下令沿海各省将以前所定的海禁处分之条例尽行废除，允许国人出洋贸易。同一年，清政府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地方为通商口岸，并成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负责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各项事务。在四个海关中，只有粤海关专设“监督”一职，“监督”多数由满人担任，且由皇帝直接任命，权力非常大，地位与行省的督抚大员相埒，可见粤海关的地位比其他三个海关要高。粤海关有总口七处，即省城大关总口、澳门总口、庵埠总口（在潮州）、乌坎总口（在惠州）、梅菪总口（在高州）、海口总口（在琼州）和海安总口（在雷州）。在总口下面又设有60多个小口岸，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税网。粤海关上缴的关税最多，“自1783年以后，粤海关便跃居全国二十九个税关的首位。嘉庆年间，粤海关关税收入达到百万两以上，超过了广东省地丁银（一百二十五万两），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① 粤海关的设立是我国海外贸易管理体制的一大进步，但它的弊端还是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陋规多。清朝的关税

① 邓端本、章深著：《广州外贸史》（上册），第276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

主要分船钞、货税两种，船钞指的是根据船只的大小、宽窄不同而分别征收的税，货税一般按货的精细与重量征收。这两种是正常的税收，除此以外，粤海关的上上下下，从监督到书吏、家人、通事、巡役等等巧立名目，对商人横加勒索，而这些费用加起来有时比正税竟然还要多两倍以上。另外，为了防止中国人与外商接触，消除“隐患”，清政府制定了很多限制对外贸易的条例。例如对来华外国商人的商业活动、居住处所、出口货物等设立了不少禁例。1755年，以洪仁辉为首的英国商船扬帆前往浙江宁波进行贸易，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想避开粤海关官吏的盘剥，一是想直接进入丝、茶的主要产地，以降低交易成本。英商企图“移市入浙”的做法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担忧，因为江浙一带不但物产丰饶，而且是华夏文明礼教之乡，如果让外国商人进入，有可能会危及大清的统治，这就是乾隆所说的“浙民习俗易器，洋商错处，必致滋事”。^①另外，粤海关比浙海关更加严密、坚固，既可以保障关税的征收，又可防范外商滋事。基于这两个考虑，乾隆下令增收浙海关的税收，目的在于欲使外国商人感到无利可图而重新返回粤海关。但是，虽然清政府对浙海关征收的税多了一倍，却仍阻止不了英商北上之势，英商还是把船开往宁波。清政府于是在1757年11月下令封闭闽、浙、江三个海关，只留粤海关对外通商。至此，粤海关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全部集中在广州一口进行，而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则由十三行行商操纵。十三行是在粤海关成立的第二年建立的，它主要分布在现在广州市的文化公园到海珠南路一带。根据清政府

^① 《清高宗圣训》卷281，第5页。

的规定，除了十三行行商外，外国商人不能与其他中国商人直接发生买卖关系，这既可以保持与外国人通商，又可以避免外国人过多与中国人接触。



十三行街

从 1757 年到 1842 年，在这长达 80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的对外贸易全部集中在广州一地进行，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广州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一，广州的进出口商品种类急剧增加。当时全国各地 80 多种的特产源源不断地被运到广州出口，其中茶叶、丝绸和土布是最重要的出口货物。同时，外国的商品约 150 种也不断地运入广州进行贸易，其中从欧美各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羽缎、毛织品、自鸣钟、玻璃镜、檀香水等等。在广州，中外珍奇异品可谓琳琅满目。二，外国在广州设立的商馆不断增加。当时，英国、法国、

荷兰、丹麦、瑞典、美国、西班牙等国家为了贸易的需要，均纷纷在广州现在的文化公园一带建立商馆，形成了广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三，进入广州的外国商船与日俱增。据统计，从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1749—1838年），外国商船到粤海关贸易的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如1749—1758年，来粤的外国商船仅有194艘，1829—1838年则激增到1101艘，而这90年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共有5266艘。^①如此之多的外来商船，反映了广州外贸的兴旺繁荣，难怪英国人威廉·希克认为珠江上的船舶来往的繁忙景象可与英国的泰晤士河相媲美。四，粤海关的关税收入显著增加。随着外国商船接连不断地进入广州贸易，关税收入也显著增长。有学者对从1757年到1837年粤海关的税收进行了统计：“在乾隆二十二至四十九年（1757—1784），粤海关的税收，平均每年为50万两；乾隆五十年至六十年（1785—1795），平均每年为102万两；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1796—1820），平均每年为143万两；道光元年至十七年（1821—1837），平均每年为152万两。”^②显然，粤海关如此巨大的税收乃是清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给本国企业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极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一口通商期间，虽然广州的外贸高度繁荣，但对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来说，他们并不满足于仅在广州一地通商。为此，英国政府做出了两次尝试。1792年，为了

① 黄启臣：《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1644—1840年）》，见《广州外贸两千年》，第215—216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8月。

② 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第185—18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

与清政府建立外交与商业联系，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政府派遣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前往中国。这个使团共有 90 人，由科学家、作家、医官及卫队组成。清政府对英国使团此行的真实目的并不清楚，还以为这是英国派来的第一批“贡使”，因而接待得很隆重。后来，在觐见乾隆的礼仪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清政府要求英国使团遵守“天朝法度”——行跪拜礼，英方认为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而拒绝。经过几番商讨，最终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马戛尔尼以见英皇的礼节觐见乾隆，也就是单膝下跪。随后，英国使团向清政府提出六点要求：（一）准许英商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二）准许英商按照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在北京设立货栈；（三）在舟山附近划出一小岛，作为英商停泊、存放货物及居住之所；（四）在广州附近开辟一个地方，使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五）对从澳门运往广州的英国商货给予优待免税或减税；（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中方不应额外加征，并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乾隆以这些要求与“天朝体例”不合而断然拒绝，马戛尔尼使团的希望因此而全部落空。英国这些要求明显具有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特别是要中国割地的要求更属于强权霸道的行径。清政府为了维护中国主权而严正拒绝，无疑是正确合理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清政府坚持闭关自守，反对扩大中英两国的正当贸易，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也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1816 年，英国政府又派出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带着当年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再次来到中国。同样的是在觐见清帝礼节这一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结果是大家不欢而散，英国政府的努力再次归于失败。

由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并且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此英国的工业品很难在中国获得广泛的销路。鸦片战争前，中国出口的茶、丝远远超过英国输入的工业品。为了开拓中国市场，英国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并导致了 1840 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该条约一共 13 款，其中包括：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英国可派驻领事；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与中国商人自由贸易；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等等。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转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开放通商，广州对外贸易“独开一口”的地位不复存在，商业中心也从广州逐步转移到上海。当然，商业中心的转移并不等于广州的对外贸易中断，实际上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受洋务运动中广州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外国资本的输入等因素的推动，广州的海外贸易还一度出现复苏之势。

二、清代西洋文明传入广州的五个阶段

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西方传教士也与商人几乎同时来到广州。这样广州就得风气之先，成为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的先沿地带，西方的器（物质文化）与道（精神文化）一同传入广州，并在这里生根发芽，然后传播到全国各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清代，西方文明输入广州可以分为以下

五个阶段：^①（一）1552—1775年，天主教传教时期。这个时期传播西方文化的主体是以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他们介绍的主要是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和军事技术，同时也带来了自鸣钟、三棱镜等一批西方奇器。18世纪后期，由于罗马教廷一反利玛窦开创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调和的路线，引发了“礼仪之争”，清政府陆续采取禁止天主教传教的政策，再加上1773年教皇克莱孟十四下令解散耶稣会，中西文化交流因而中断了一段时间。（二）1807—1840年，基督教新教传入时期。英国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于1807年踏入广州，拉开了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序幕。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合作翻译《圣经》并于1819年出版；裨治文于1832年在广州创办《中国丛报》；郭士立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医学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把种牛痘的技术带到广州并传到邻近各省；1835年，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开设新豆栏医局，西医逐渐传入中国。（三）19世纪中期（1840—1870年），西学在广州传播已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开埠以后又有新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在广州以办学校、建教堂、开医院、出书刊等形式来传播西学，同时，岭南人也以主动的姿态吸取西方文化，主要表现在吸收世界历史地理学知识和西方的军事技术知识等。（四）19世纪后期（1870—1895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主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新局面。此时，西方

^① 分段方法参考了刘圣宜、宋德华所著的《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和熊月之所著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

的经济思想、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等逐步传入广州。

(五) 19、20 世纪之交 (1890—1910 年)，由于维新运动的推动，岭南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译介成为重点。

清代输入广州的西方文明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在此，我们只是撷取其中的五个侧面进行重点探讨，以期为深化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稍尽绵薄之力。

输入广州的西方文明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在此，我们只是撷取其中的五个侧面进行重点探讨，以期为深化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稍尽绵薄之力。